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3.010

## 《湘报》与晚清湖南信息传播模式的现代转型

阳海洪, 赵亚丽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媒介不仅传播信息, 而且对人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身份建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湘报》从变法维新、改革现存秩序的目标出发, 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与传播效果等方面, 将“传达者”的官报传播模式, 改造为“启蒙者”的现代化传播模式, 重构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方式。如此, 政党与传媒携手, 成为意见竞争的参与主体与主要方式, 传媒成为意见竞争与关系管理的平台和现代政治运作的基础, 其极大地增强了现代传媒的传播力, 也为近代湖湘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渠道。

**关键词:** 《湘报》; 晚清湖南; 传播模式; 湖湘知识分子; 意见竞争; 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 G21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0)03-0073-08

**引用格式:** 阳海洪, 赵亚丽. 《湘报》与晚清湖南信息传播模式的现代转型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3): 73-80.

### *Xiang Daily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una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od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YANG Haihong, ZHAO Yal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Media not only spread information, but als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people's thinking mode, social relation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Starting from the goal of reform and reform of the existing order, *Xiang Daily* transforms the official newspaper communication mode of “communicator” into the modern communication mode of “enlightener” and reconstructs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d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 communication channel, communication content, communication audience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In this way,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media work have become the main participants and the main way of the opinion competition. The media has become the platform of the opinion compet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operation. It has greatly enhanced the communication power of the modern media and provided a new channel for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收稿日期: 2019-11-21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课题“湖南现代化——报刊与湖南早期现代化(1897—1919)”(XSP19ZD1020);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湖南工业大学研究基地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湖南文化产业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2019hnwc02)

作者简介: 阳海洪(1969—), 男, 湖南冷水江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和影视文化; 赵亚丽(1995—), 女, 甘肃陇南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

modern Huxiang intellectuals.

**Keywords:** *Xiang Daily*; Hunan in late Qing Dynasty; communication mode; Huxiang intellectuals; opinion competi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古代湖南文化落后,在历史上寂寂无名,但近代以来,人才勃兴,云蒸霞蔚,蔚为奇观,乃至有“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之说。对于近代湖湘人才群崛起及其政治参与热情高涨之原因,学界或从本质主义路径出发,将其归结为“经世致用”“坚忍卓绝”等与其他区域文化相区别的湖湘文化特质;或从制度变迁角度出发,强调清代湖南科举分闱、近代教育勃兴的重要作用。这些观点,对于观察和理解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提供了历史洞见。简言之,引发湖南变迁的历史力量,是如同平行四边形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在这历史合力中,作为“资本印刷主义产物”的大众报刊,是引发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变量。在封建社会,“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主居于信息传播金字塔的顶端,控制了所有的信息和资源,建立了垂直型的官报信息传播体制<sup>[1]</sup>。朝廷通过传达政令,在全社会中复制皇权旨意,达到“国体尊”而“民听一”的舆论目标,高度集权的官报体制犹如一根巨大的“搅拌棒”,插入广袤的帝国疆域,打破了社会的“蜂窝状”形态,维系着民众对于皇权的认同。近代以来,西方报纸舶来中土。作为一种产生于市民社会且具有“社会自由”特征的西方“长技”,松动了封建统治的言禁政策。在湖南新政运动中,湖南士绅利用晚清地方政权下沉的历史机遇,创办了《湘学报》《湘报》等报刊,服务于湖南新政改革。作为转型时代的产物,《湘学报》《湘报》的信息传播方式既脱胎于传统的官报模式,带有旧时代的痕迹,同时又因中西交通之时代影响,呈现出现代性特征,因而其以报刊为中心,对传统士人关系进行了重构。传媒作为政治观点与社会整合的平台,为湖湘士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历史机遇;湖湘士人利用传媒团结同志,组建社团,推动了近代湖南士人的崛起和政治参与方式的变革。本文以拉斯韦尔的“五W”为分析工具,概述《湘报》与晚清湖南信息传播模式的现代转型及其历史影响。

## 一 《湘报》与传播主体的现代转型

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敌”,国人因限于“华夷之辨”的陋识,对于接受西方文明裹足不前。甲午之役后,国人认为,日人之胜利乃君主立宪制度之胜利,西人之强,不在于坚船利舰,而在于西方之文明,在于支撑此坚船利舰之“学”、之“智”。由是反观中国,因受制于皇权压抑,统治者以“弱民”为术,民智、绅智、官智低下,必须努力创设报纸、学堂和学会等新型文化机构,以广开国人之“智”。《湘报》对传播主体的认知,突破了三纲五常等级制的限制,以“智”“变法”作为其衡定标准。《湘报》对“谁”能传播的回答是,只有那些熟知西方文明、支持维新变法的人才能成为传播主体。

### (一) 具有改革精神的皇帝

在晚清知识精英对近代民族危机的归因路径中,皇权专制成为国家积贫积弱之根本原因,由此晚清知识精英号召人们“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sup>[2]</sup>。随着光绪帝积极支持变法,并重用维新人士,维新派改变了对于皇权的态度,政治策略亦为之一变。“藉君权以畅己意”,借助君权,达成维新目标,成为维新派的诉求目标。简言之,维新派并不一般地反对皇权,而只是反对墨守陈法、拒不变法的皇帝。在《湘报》的传播模式中,君权至高无上,光绪皇帝处于传播权之最高位置。“愿吾皇操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已极,虽有目前,抑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蹶天无路,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宗庙可质,支那父老,或其谅我。’”<sup>[3]185</sup> 维新派期待光绪帝能像俄之彼得大帝、日之明治天皇一样,天纵英明,“为自强本计,累降纶綍,布此义于天下,江淮闽浙,秦晋鄂蜀,开风兴起,云鳞丛萃”<sup>[4]492</sup>,登高而呼,领导中国改革运动,扫除一切阻碍势力,实现国

强民富的目标,因而其积极刊登光绪帝推行新法的谕旨,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所具有的“扩音效应”,极力宣传光绪帝变法维新的决心和施政举措,并将之作为自己与守旧派进行斗争的政策支撑与法理依据。

## (二) 具有维新意识的官员

《湘报》是官委绅办的产物,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主政湖南期间,以改革为治湘第一要务,《湘报》出现于湖南,与这些具有维新意识官员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宝箴等人支持创办报刊,在于他们看到了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周知时事,通晓民情”的沟通作用。《湘报》创办后,陈宝箴鼓励政府公开信息,支持新闻工作。在熊希龄呈请将抚院文告刊刻《湘报》的公呈上批示道:“报刊开诚心,布公道,古者木铎徇路之音,盖莫捷于此矣,所请自应准予立案。除未定之咨谋,应密之机事未便遽行宣示外,所有应行之件,仰候随时飭送该馆刊刻,以资考证而实见闻,此覆。”<sup>[3]127</sup>在《湘报》看来,具有变法维新意识的官员是现代传媒的当然传播主体;因此,《湘报》与湖南抚院展开了良好的合作,政府各项新政的公文、奏稿、禀稿、批示和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等官员在南学会的讲义以及一些公务活动,都在《湘报》上得到了呈现。

## (三) 维新派士绅

在《湘报》关于近代传媒的传播主体认知中,最具资格的应该是初具西学知识、具有维新意识的从传统士大夫中分化出来的新型士绅。这种观念既是湘军崛起后晚清湖南绅权扩张的产物,也是此时湖南一批年轻士绅接触了西方文明之后,主张维新改革,冀图通过创办传媒,为湖南维新营造舆论氛围的结果。《湘报》由熊希龄在具有维新意识的官绅中集资而成,《湘报》所刊文章,亦以维新人士为主(特别是前期)。而南学会对学会在成员资格认定中,虽不拘籍贯,但明确将守旧人士排除在外,“凡旧日所有拘墟之习,骑墙之见,入此会者务宜屏除。”<sup>[3]107</sup>在南学会讲学的官绅,亦主要是皮锡瑞、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谭嗣同、熊希龄、戴德成、欧阳中鹄等维新运动的主持者和参与者。在时务学堂中,熊希龄任总理,全面主持学校行政管理工作。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叶觉迈、韩文

举等为中文教习;梁离湘后,添聘唐才常、欧榘甲为中文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王史为西文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俱是维新士绅。在维新士绅的擘画中,“开民智”“开绅智”与“开官智”为新政之根本,是彼时湖南最为紧要之事。“开民智”赖学校;“开绅智”则赖学会;“开官智”则赖课吏馆。课吏馆要多备新书,“多备报章”,并“延聘通人为教习,评阅功课”<sup>[3]217</sup>。在这里,维新士绅所谓能成为指导官、绅教师的“通人”,指的就是这些新式士绅。

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不是职业报人,办报不过是他们搭筑政治平台的“脚手架”,他们对传播的思考,是与其变法策略密切相关的。维新派的变法策略有二:一是自上而下,维新派上书皇帝,借助君权,将维新派之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二通过立会、办报与合士大夫之群,或联合地方开明官僚,由下而上推行变法。其策略之转移,以康有为觐见光绪帝为分水岭。前期主要是由下而上的策略,后期主要是由上而下的策略。策略虽有变化,但维新派的位置不变,乃有康有为了朝廷中设“制度局”,对变法维新进行总体规划与指导。“新政来源真可谓令我辈”<sup>[5]</sup>,维新派应该是理论的提供者和新政的策源地。在维新派看来,他们才是那个时代“先知”和坚定的“改革者”,他们的主张才是救国的唯一道路,他们才是传播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他们处于传播活动的“前在”地位,对传播什么、怎样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把关”作用。在晚清湖南的传播活动中,维新派士绅处于不可否认的优势地位。

## 二 《湘报》与传播渠道的现代转型

在湖南新政运动期间,现代信息传播渠道除了《湘报》之外,还有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湘报》“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彼此阴相策应。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成立后,全省纷纷改书院为学堂,在南学会之下成立各种分会和其他学会。《湘报》与学堂、学会互为表里,成为宣传变法思想、推动湖南新政的舆论阵地。

### (一) 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是湖南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它标志着湖南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



的转变,也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开始。时务学堂对教学内容有详细规定,与旧式的封建科举教育相比,其有了很大的变化。时务学堂学生学习时,须先钻研经书中的微言大义、民权思想,然后择取中外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参证,以使学生在中西互参中明了维新变法的旨意。时务学堂以读书笔记和讨论驳难为主要教学方法,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精神。学生札记、老师批语及师生讨论内容都成为《湘报》的报道内容,并被搜集刊刻出版,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在维新诏令和时务学堂的推动下,创设新式学堂的浪潮波及湘省。各州县纷纷改书院为学堂,更定章程与教学内容。据《湘报》记载,湘省共有13所书院改革,添设西学课程;稟请创设或改建学堂11所,湘潭、攸县等地请求变通县试,改课实学。平江、永明等地得知梁启超大名,专函托他代聘教习,代购书籍器材。这些新式学堂成为现代信息的传输管道。

### (二) 南学会

南学会是一个成立于戊戌变法期间带有救亡性质的政治学术团体。南学会由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倡议筹办,会址在长沙孝廉堂,并且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南学会在长沙设总会,各府厅州县设分会,并可设立专业分会。按南学会章程,学会宗旨“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sup>[3]268</sup>;“本会以同心合力,振兴中国为务”<sup>[3]284</sup>。南学会最主要的活动是讲学,讲学人员以维新派士绅为主体,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等主政湖南的主要官员亦曾到会演讲,内容涉及政教、外交、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南学会的另一项活动是讲演者与听讲者之间的问答。为扩大传播效果,南学会的讲学内容和答问都刊发在《湘报》上。南学会的示范作用与湖南官绅的倡导,有力推动了湘省学会的成立。据统计,戊戌期间,湘省前后共成立大小学会15个,湘省风气为之一变。

学会、新式学堂和近代传媒都是晚清兴起的制度化传播平台。在湖南新政运动中,主持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报》的都是一群同样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用这些近代化的传播平台,宣传其政治观念,获得舆论权威,赢得社会声望,使之成为参与政治的有效管道。

## 三 《湘报》与传播内容的现代转型

唐才常、熊希龄与谭嗣同等人创刊《湘报》,是服从和服务于他们的政治改革目标的。《湘报》对现代文明的传播,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诸方面,为湖南新政运动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超前的现代性方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尽管其中还不乏对西方文明的误读,带有“裹脚时代”的旧气息,但其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的认知与改造中国的愿景。“敢为天下先”的作风,也使湖南成为维新时期最富生气的省份。

### (一) 现代政治观的传播

在先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洋务派所主张的器物层面的改革破产,这引发了他们对传统政教制度的质疑,他们因此主张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将改革推进到制度层面。他们运用自己所刚刚掌握到的进化史观,来分析古今中外的政治制度,认为政治制度演进是自然规律,不能躐等而行。“然则中国欲复三代盛时之治,自宜行英德奥意大君民民主之法。”<sup>[3]154</sup>君权与民权共举,君主立宪制度成为维新派推崇的政治制度设计,“倡民权,设议院,是维新派最根本的两项政治主张。”<sup>[6]</sup>《湘报》主张在“民权”“平等”等现代性基础上,重构国家合法性基础,认为这样国人才会对国家产生认同感和凝聚力,国家才能强盛。“公论者,遂起民权,撰议院,开国会,以忧违责之四万万,而策群。曰:四海一心。一心者,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sup>[3]186</sup>“民权”概念的导入,合法性基础的转移与重构,解决了国家权力主体的资格问题,表达了维新派反对专制皇权的呼声。他们认为,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应先“兴绅权”。《湘报》借助民权政治的中国化理解,绅权政治观点获得了表达。在晚清湖南知识分子看来,“绅权”与议院相结合的政治是最完善的制度,其能限制、弱化以皇权为代表的行政权力,有效推动中国政治改革。

在《湘报》对现代政治思想的传播中,民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抓手,它紧系政治之振兴与国家之强盛。《湘报》所建构的民权话语,是在

批判和超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民主学说而形成的。其尽管还带有时代的局限,但在三湘大地传播了民主理念,促成了国民参政意识的觉醒,为近代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开辟了道路,为近代中国宪政理论的建构、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乃至民主革命的爆发做好了必要的前期准备。

## (二) 现代外交观念的传播

面对西方虎视鹰瞵的外交危局,主持《湘报》工作的唐才常、熊希龄、谭嗣同等人,目击时艰,心忧国事,意识到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挑战,传统的“仁义外交”和“礼义外交”方式已不足论,中国已由“天下”进入“国家”时期。他们深刻意识到,为了在未来世界中体面而有尊严地生存下去,中国必须改变既往的外交观念,寻求与各国和平相处的方式。他们以“民权”为导入路径,主张将中国改造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特征的现代国家,其完整表述了近代国家的主权思想,彻底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观念。他们主张中国需在平等之基础上重构外交思想,其积极借助近代报刊,在儒家“和戎”传统与现代外交观念的交相激荡中,传播“守约和夷”“联夷抗夷”“自强制夷”的现代外交思想,试图以此来影响政府和社会。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现代邦交思想的最后形成均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 (三) 现代经济观念的传播

《湘报》作为一份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办的报纸,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是其政治纲领的重要内容;因此,经济新闻及其相关言论是其重要内容。在价值层面上,《湘报》展开了对“私权”合法性的论证。

“在理论源头上阐释西方人权和私有制的天然合理与强大生命力,以及在富国强兵中的不可替代作用。”<sup>[7]</sup>在《湘报》看来,西方之所以强大,就在于能用其“私”,刺激国家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国只有充分发扬“私心”,调动国民之积极性,“人急其私,家争其私,国任其私”,才能增强综合国力。“然则,能私则可立国,可保人民,可保疆土,可保物产也。敢呕心沥血告我支那:私,大愿;私,大力;私,大群。成

大私,如其能也,则有英、普、法、日等国之已事在;如其否也,则有非洲、印度、荷兰及中土等属国之覆辙在。”<sup>[3]257-258</sup>在实践层面上,《湘报》主张改变传统的“抑商”政策,鼓励发展资本主义;认为中国宜学习西方,革除弊政,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障碍,促进民营经济全面发展,以实现国富民强之目标,全力应对西方的经济侵略。

## (四) 现代文化观念的传播

《湘报》是维新派创办的政治性报纸,唐才常、谭嗣同等人通过《湘报》鼓吹兴民权、设议院,推行君主立宪制,倡导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主张按国际公法与西方国家进行交往。其在主要传播这些现代性观念的同时,也传播了现代科技、文化与社会观念,促进了湖南现代意识的觉醒。具有维新意识的湖南士绅,以“开智”为价值基点,将教育改革视为变法维新的核心环节:“惟变学校变科举,因之以变官制,下以实献,上以求实,使贤才等庸而在位之人心以正。”<sup>[8]210</sup>其批判传统科举教育,鼓吹教育改革,“广开学校,悉师西法”,改传统书院为新式学堂,改虚文为实学,兴办师范,聘请熟悉时务、了解西方文明的新式教师,讲授西方现代文明。《湘报》意识到了科技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的科技知识,积极传播西方的科学观念与方法。其在新闻报道和讲学活动中,“介绍的科技知识五花八门,内容极其广泛,且常带有趣闻、奇闻的色彩。”<sup>[9]</sup>倡导中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主张“格致之学以倡之,机器以捷之,轮舟以通水,铁路以通陆”;“公司以维之,学会以持之,学堂以成之,专利以为奖,保护以为功”<sup>[3]334</sup>。《湘报》呼吁政府应该实行鼓励科技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奖励各种发明创造,在学校中增加科技教育内容,培育科技人才,全面提升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实力。同时,《湘报》在推动政治改革的同时,将“不缠足”视为现代民权的重要内容,积极传播以“不缠足”为核心的现代女权观念,要求坚决摒除陋习,推动良风美俗的养成,并建立不缠足会,极力推动女性放足,以解放对女性身体的禁锢,这在湖南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 四 《湘报》与受众观念的现代转型

《湘报》接受了西方的民权政治观念,主张“人



人有自主之权”，且现代传媒是大众消费品。这本应是个极清晰的问题，没有探讨的必要，但将受众问题落实到历史情境中去，《湘报》与受众的传受关系，就具有了丰富的历史意味。

### (一) 想象的受众：普通民众

如前面所说，《湘报》反对封建专制，主张民权政治，“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钜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出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而可贵。”<sup>[8]270</sup>而利用现代传媒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就是民权政治的“肉身”体现和核心内容。这体现在《湘报》的受众设计中，即普通民众都是现代传媒的受众，惟有如此，方能开启民智，建立现代国家。唐才常在发刊词《湘报序》中说，熊希龄等人创办《湘报》之目的，即在于“以使圆颅方趾，能辨之无之人，皆易通晓”<sup>[3]1</sup>。简言之，在《湘报》看来，众生平等，要秉佛家普度众生之旨，启迪普通民众。谭嗣同在《湘报序》中，痛批古代史籍尽为“官书”，提出了“报为民史”的思想观点，认为报纸的责任就是要记载民众之生活，反映民众的声音。“无论贵贱贫富、士农工商，皆可阅报。”<sup>[3]213</sup>《湘报》虽基于其民权政治理念，主张报为民史，“无论贵贱贫富、士农工商，皆可阅报”，但在实际运作中，《湘报》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湘报》所刊内容，皆是官绅之言论与政治生活，并没有成为“民口”“民史”；报纸的发行对象，也不是针对普通民众。在《湘报》的受众设计中，维新派出于将自己置于道德高地、确立改革合法性的需要，将民众高悬；因而，其民众只是想象中的受众，真正的受众，却生活在“别处”。

### (二) 真正的受众：不具维新意识的官绅

在《湘报》的认知中，开民智虽为其致意之目标，但中国地域辽阔，民众数量巨大且素质低下，在严峻的救亡情势面前，广开民智缓不济急。作为传统中国精英的官绅，不但数量少，且受有相当之教育，承担着教化百姓、管理地方事务、执行各项新政的责任，乃变法能否成功之关键。因此，为达速效之目标，“开官智”“开绅智”，乃是变法维新“万事之起点”。陈宝箴也意识到，湖南新政“其要者在董吏治，辟利原，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sup>[10]</sup>，提升官员的现代政治文明修养及其行政水平成为新政改

革的重心。因此，在《湘报》的受众设计中，官绅才是其真正的受众。

在《湘报》看来，“今中国之绅士，使以办公事，有时不如官之为愈也。何也？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今其无学、无智既与官等，而情伪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则用之何为也？”<sup>[3]209-210</sup>简言之，中国绅士虽熟悉地方事务，但他们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缺乏与维新相应的现代知识储备与管理手段，如果不进行相应的学习与改造，这些绅士是不能适应新形势之需求的。为此，必须向这些绅士传播西方文明观念，培养其管理地方事务的能力。“故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咸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励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sup>[3]210</sup>同时，设课吏馆，购西学新书，并“多备报章，以资讲求”。在《南学会申订章程》中，报刊亦被指定为阅读品，学会“将添购各种新闻报章，自本月十五日起，愿阅报者，照章领凭择观”。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以政府公文形式，要求所属州县、书院订购新式报刊，“分交书院肄业各生及城乡向学子，一体披阅。”<sup>[3]259</sup>平江县令亦通令“四乡团绅，人各阅报”<sup>[3]419</sup>。《湘报》也明确提出“无论官绅士商均送报半月，不取资费。半月以后有愿阅者，请知会送报人挂号，注明姓氏居址，以便逐日送报，按月收费”<sup>[3]1</sup>。在《湘报》看来，报纸还是高级读物，只能为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官绅所阅读，而普通民众，不读书不识字，不濡孔教，只能是“愚民”，自然不会“以舍身爱国为心”，由他们来参与改革只会导致“匹夫倡乱，杀人如麻”的结果<sup>[3]153</sup>，其自然是排除在受众群体之外的。

## 五 《湘报》与传播效果的现代转型

古代传播思想形成于手工印刷的农耕时代，信息生产效率的低下和“礼治”作为道德践履的传播要求，使得儒家更注重传播效果的长期性，其主张多“闻”、多“问”、多“思”、多“省”、多“习”。通过这样“知→思→行”的反复训练后，

儒家之道会慢慢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共识, 转化成规范, 修正其社会行为, 使其言行不溢出礼治的制度和程序。在儒家看来, 传播就是一个不断“去蔽”而复归于本真与良知的过程, 需要反复进行, 只有这样, 抽象的礼才能如盐之溶于水、水银泻地般化为成员的内在认同, 在“教”与“化”的过程中建立起对礼治秩序的认同并最终影响其行为。

与古代传播所处环境不同, 维新派是在西方列强“虎视鹰瞵”的国际秩序与资本主义强大的信息生产能力的环境中展开对传播的思考的。面对这种危亡形势, 维新派对推动变法维新、挽救民族危亡充满焦虑情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反对洋务运动的“枝节”改革, 认为洋务派所提出的变法自强主张, 见效太慢, 缓不济急, “吾恐既强之后”, 国家“已豆剖瓜分于他人之囊橐也”<sup>[3]153</sup>。他们对自己的变革主张充满乐观的预期, 因而主张“大变”, 进行全面改革, 对社会问题进行一揽子解决; 而且主张“激变”“立变”, 在短时间内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成为现代国家。将这种救国之“焦虑”与预期之“乐观”心态坐实在传媒领域, 就是“思以二三报馆之力, 转移天下”<sup>[3]90</sup>, 追求“魔弹论”式的即时传播效果, 即受众在阅读报纸后能立即接受维新观念, 并付诸行动, 在顷刻间改变全国之风气, 这样国家才有希望。“大局之患, 已如燎眉, 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 苟其欲之, 则必使六十馀州、县之风气, 同时并开, 民智同时并启, 人才同时并成, 如万毫齐力, 万马齐鸣, 三年之间, 议论悉变, 庶几有济。”<sup>[3]201</sup> 光绪皇帝在听从维新派主张后, “为自强本计, 累降纶綍, 布此义于天下, 江淮闽浙, 秦晋鄂蜀, 开风兴起, 云鳞丛萃”<sup>[4]492</sup>, 全国就能闻风而动。至于其实际传播效果, 康有为称它是“全国最好的一张维新报纸”, 梁启超也赞许它是戊戌时期日报中的“巨擘”<sup>[11]</sup>。《湘报》“是为湖南有报纸之始, 其报纸宗旨有二: 一曰鼓吹民主政治, 二曰发挥湖南人固有精神。虽发行为匝岁, 而见锢于清政府, 然湖南人自此昭苏, 后此奇才蔚起, 以缔造我中华民国, 《湘报》之赐也”<sup>[12]</sup>。陈天华亦说:《湘报》“既风行湖南, 全省之人皆震动, 学堂、演说会、不缠足会等到处响应。西洋人至呼为湖南狮子吼”<sup>[13]</sup>。简言之, 近代传媒在湖南士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对于推动湖湘

文化转型和近代湖湘人才群体的崛起, 确实具有效果。

麦克卢汉认为, “媒介即讯息”, 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不仅传播信息, 而且对人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身份建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湘报》从变法维新、改革现存秩序的目标出发, 打破了皇帝、官僚等对信息和传播渠道的垄断, 创办了近代传媒, 戊戌时期由传统士大夫阶层转化而来的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阶层也因此逐步形成。因受到民族危机刺激, 其主张变法维新, 通过报纸、学会、学校等现代媒介, 传布现代思想观念, 在社会上发挥了极大影响力。唐才常、熊希龄、谭嗣同等湖南士绅, 虽出身科举, 但他们的社会角色与影响, 已经不是依附科举制度与官僚体制, 而是凭借《湘报》、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等现代传播媒介, 传播现代西方文明, 宣传变法维新思想, 启迪民众关心国家前途, 引领湘人参与政治生活, 冒险犯难, 以挽救民族危亡, 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 各种不同的改革话语与政治方案通过传媒广泛传播, 不同党派和团体成为意见竞争的参与主体, 中国开始进入“主义喧哗”的思想解放时代。

皇权制度历来对官绅之间的横向交往保持高度警惕。其严禁朋党, 并为了监视官员之间的交往, 设立特务组织, 以为皇权之耳目。创设“廷寄”制度, 鼓励官员之间彼此告密, 强化皇权对官员的监视。在其控制下, 信息只有上下流动而无横向传播, 进入官报传播的官绅彼此保持的都是原子式的、碎片状的政治关系, 这样就避免了其对皇权构成威胁。《湘报》传播模式改变了官报信息垂直传播的传播模式, 代之以士绅之间的横向交流模式, 将以权力服从为中轴的传播关系改造成以观点选择为轴心的传播关系。由于皇帝及其官僚体制垄断了新闻传播的权利, 官报体制中“传”“受”所体现出的是官僚等级关系。《湘报》传播模式已然呈现出新型传播关系特征, 在这种新型传播模式下, 士绅之间的横向流动开始瓦解官僚等级关系, 信息优势成为传播主导力量, 传播权开始向拥有信息优势的新型知识分子手中转移, 呈现出职业分殊的特点, 新闻传播的社会

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转变必然导致现代社会中新闻人的关系的调整与组合,并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运作产生影响。同时,士绅之间的横向交流改变了传统中国“君子不党”的政治传统,使改革者和改革者通过现代传媒得以相遇,学会、报纸、学堂三位一体的传播机构,为建构新的政治关系建构了可能。在这些新型文化机构里,报刊编辑同时是学会的组织骨干和学堂的教师,学会(或书局)为报刊出版和学堂开办提供组织网络和其他各种条件,学堂则为报刊和学会输送人才。“夫以学会扩学堂之模,更以报馆畅学会之流,开智之义,固莫善于此矣。”<sup>[3][375]</sup> 学堂、学会、传媒彼此声气相求、互相支持,成为中国早期政党、社团的组织形态。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何来保、林圭等围绕在《湘报》周围的这批维新知识分子,或创办《湘学新报》《湘报》等报章杂志,或在时务学堂等学校教书或求学,或从事自由结社,如南学会或其他知识性、政治性组织,结成话语同盟。自此,由新型知识分子结合而成的各种社团、政党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批涌现。政党与传媒携手,并成为意见竞争的参与主体与主要方式。由此,传媒成为意见竞争与关系管理的平台和现代政治运作的基础,这极大增强了现代传媒的传播力,也为近代湖湘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提供了新渠道。

#### 参考文献:

- [1] 阳海洪. 仁礼同构.“5W”模式下儒家传播思想的问题意识[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6(3): 112-115.
- [2] 谭嗣同. 仁学[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312.
- [3] 《湘报》报馆: 湘报: 上卷(影印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4] 中国史学会. 戊戌变法: 四[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 [5] 中国史学会. 戊戌变法: 二[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542.
- [6] 尹飞舟. 湖南维新运动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213.
- [7] 沈毅. 《湘报》经济新闻报道研究[J]. 当代传播, 2010(6): 115-117.
- [8]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M]. 蔡尚思, 方行, 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9] 董贵成. 《湘报》与科学技术的传播[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5, 22(1): 106-110.
- [10] 陈三立. 散原精舍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3.
- [11] 张静庐.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68.
- [12]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第5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7.
- [13] 陈天华. 陈天华集[M]. 刘晴波, 彭国兴, 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8: 15.

责任编辑: 黄声波